

学 | 术 | 史 | 从 | 书

陈平原 著

---

# 中国现代 学术之建立

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

---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为国家教委科研基金资助项目

学 术 史 从 书

陈平原 著

---

# 中国现代 学术之建立

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

---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: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/陈平原著. -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8.2

(学术史丛书/陈平原主编)

ISBN 7-301-03592-6

I. 中… II. 陈… III. 文化-学术思想-研究-中国-现代 IV. G0-06

书 名: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

著作责任者: 陈平原 著

责任编辑: 张凤珠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3592-6/G.436

出版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电 话: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

印刷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发 行 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875 印张 360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: 23.50 元(平)

27 15 / 15

## 目 录

导 言 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·····	(1)
一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·····	(2)
二 “西潮”、“古学”与“新知”·····	(9)
三 走向专门家之路·····	(13)
四 章、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·····	(20)
第一章 求是与致用·····	(28)
一 “学在求是,不以致用”·····	(29)
二 “殚精考索”与“兴起幽情”·····	(43)
三 理器之分与真俗之辨·····	(53)
第二章 官学与私学·····	(70)
一 “劝学”与“学隐”·····	(72)
二 “学在民间”之自信·····	(83)
三 书院讲学的魅力·····	(93)
四 救学弊与扶微业·····	(102)
第三章 学术与政治·····	(116)
一 参政与回向·····	(117)
二 保国或著书·····	(125)

---

三 讲学复议政·····	(136)
<b>第四章 专家与通人</b> ·····	(155)
一 古老命题的现代诠释·····	(157)
二 “具有广博学识”的专家·····	(161)
三 “博学的人”与“国人导师”·····	(168)
四 从“开山斧”到“绣花针”·····	(174)
<b>第五章 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</b> ·····	(185)
一 从“大胆假设”到“小心求证”·····	(187)
二 双线文学观念·····	(193)
三 历史演进法·····	(202)
四 《红楼梦》自传说·····	(211)
五 整理国故思潮·····	(220)
<b>第六章 关于经学、子学方法之争</b> ·····	(240)
一 “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”·····	(241)
二 《庄子》的挑战·····	(243)
三 清儒之得失·····	(247)
四 章、胡之戴震论·····	(251)
五 对于“汉学”的推崇与超越·····	(256)
六 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?·····	(262)
<b>第七章 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</b> ·····	(275)
一 游侠之“逍遥法外”·····	(276)
二 “中国之武士道”·····	(283)
三 对于流血的崇拜·····	(288)
四 暗杀风潮之鼓吹·····	(294)
五 联络会党的策略·····	(301)
六 大小传统之沟通·····	(306)

---

附录 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——章太炎的 学术品格·····	(320)
第八章 现代中国的“魏晋风度”与“六朝散文”·····	(330)
一 被压抑的“文艺复兴”·····	(332)
二 逐渐清晰的文学史图像·····	(342)
三 师心使气与把酒赏菊·····	(353)
四 乱世中的“思想通达”·····	(366)
五 “谬种”与“妖孽”的不同命运·····	(375)
六 千年文脉之接续·····	(384)
第九章 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·····	(404)
一 学者为何自述·····	(407)
二 自传与自定年谱·····	(414)
三 “我与我的世界”·····	(421)
四 “诗与真”的抉择·····	(427)
五 “忏悔录”之失落·····	(434)
六 “朝花夕拾”与“师友杂忆”·····	(441)
主要参考书目·····	(457)
后 记·····	(470)

## 导言：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

-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
- “西潮”、“古学”与“新知”
- 走向专门家之路
- 章、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

倘若从事学术史研究，章太炎或许是最佳入口处。原因在于，“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”。正如侯外庐所说的，章氏对于周秦诸子、两汉经师、五朝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等，均有详细的论述，不难从其著作中整理出一部“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”<sup>[1]</sup>；对于身处其间的晚清学界，章氏也有不少精彩的评说，只是不像梁启超那样形成专门的著述。其实，作为一代名篇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也只是梁氏拟想中的《中国学术史》之第五种<sup>[2]</sup>。

晚清那代学者，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

术史,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,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,希望借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来获得方向感。同样道理,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,重提“学术史研究”,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。因此,首先进入视野的,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“二十世纪中国学术”。

没有章、梁“从头说起”的魄力,自是深感惭愧;退而集中讨论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”,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。表面上只是接过章、梁的话题往下说,实则颇具自家面目。选择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,讨论学术转型期诸面相,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,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。这就决定了本书不同于通史的面面俱到,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。

### 一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

自从余英时借用库恩(Thomas S. Kuhn)的科学革命理论,解释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<sup>[3]</sup>,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。就像余先生所概括的,所谓“典范”或曰“范式”(Paradigm)的建立,有广狭两义,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、价值和技术的改变,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,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,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。依照库恩的思路,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这样描述:典范的建立—常态研究的展开—严重危机的出现—在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,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。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维持“必要的张力”,乃是成熟的学者所必备的素质;可对于史家来说,最为关注的,很可能是危机



已被意识、新范式即将浮现的“关键时刻”<sup>[4]</sup>。依余先生之见，“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‘五四’前夕恰好碰到了‘革命’的关头”，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又恰好提供了“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、价值和技术系统”，故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典范的代表。<sup>[5]</sup>此说有力地阐明了胡适的学术史地位，但并非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完整叙述。倘若辅以王国维、梁启超的思路，或许可以更好地诠释这一学术史上的“关键时刻”。

在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中，王国维以“国初之学大，乾嘉之学精，道咸以降之学新”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。此说常被论者引述，连带也被用来为王氏自家学术定位。其实，王国维并不认同龚自珍、魏源为代表的“道咸以降之学”，因“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，而其所以切今者，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，其言可以情感，而不能尽以理究”。就像他极为推许的沈曾植一样，王国维也是“其忧世之深，有过于龚、魏；而择术之慎，不后于戴、钱”。承继清学而又不为清学所囿，乃章、梁、沈、王等晚清学人的自我期待，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，便是：

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，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。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，其必由先生之道矣。<sup>[6]</sup>

并非只是“旧学邃密”，更难得的是其“新知深沉”，晚清那代学人的贡献，实在不可低估。沈、王诸君，深刻意识到危机所在，走出“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，以图变革一切”的“道咸以降之学”，追求的正是新范式的建立。

可与王说相发明的，不妨举出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。

梁氏分学术思潮为启蒙、全盛、蜕分、衰落四期，而衰落期中，必有豪杰之士崛起，其推旧与创新，即导入“第二思潮之启蒙期”。对于自家所处学术潮流，梁氏以全盛期正统派的眼光多有挑剔，但强调破除汉学专制、接引西方学术、回归经世之学，实际上将其视为“第二思潮之启蒙期”。如此自我定位，目光所及，在于“开来”，而不是“继往”。正如梁氏所称，启蒙期之所以值得怀念，在于“淆乱粗糙之中，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”<sup>[7]</sup>。晚清的社会转型与学术嬗变，或许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面貌清晰，但其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，足证其绝非只是“清学的殿军”。

强调新典范的真正确立与发挥示范作用，胡适当然值得大力表彰；可要是更看重危机中的崛起以及学术转型的全过程，章太炎那一代学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。在我看来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如日中天，晚清一代的贡献多少受到了遮蔽。即便如此，谈论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，仍能找到不少喜欢“从晚清说起”的知音。

认准“言近三百年学术者，必以长素为殿军”的钱穆，在其名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，为康有为专列一章。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，对康氏着墨甚少，因其认定“清末三四十年间，清代特产之考证学，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，而学界活力的中枢，已经移到‘外来思想之吸受’”<sup>[8]</sup>这一思路，在其此前所撰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已有所体现，即认定康有为经学成就不高，其贡献在于“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”<sup>[9]</sup>。如此立说，表面上相当谦恭，实则蕴涵开创新时代的大抱负。作为世风推移及学术转变的枢纽，康、梁、章、王等人的角色及功能也确实无可替代。

经学史家周予同称康、章为今、古文经学的最后大师，并断言：“以后便没有大师了，作为经学，至此完结。”<sup>[10]</sup>如此单独摘引，容易引起误解，似乎康、章只属于以经学为主流的清代学术。实际上，周氏相当重视康、章新见迭现的经学研究对于“新史学”的贡献。比如，将殷周以来的中国史学，分为萌芽、产生、发展、转变四期，而转变期则“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”——周氏此文撰于40年代，断言“新史学”的崛起“实开始于戊戌政变以后”，最初的动力来自康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<sup>[11]</sup>。经学、史学如此，哲学也不例外。贺麟撰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，称“要叙述最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潮，似乎不能不从康有为开始”<sup>[12]</sup>。至于使得西方哲学“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第一人”严复，也是康有为的同代人。文学革新方面，康有为影响甚微，但其弟子梁启超之提倡“文界革命”、“诗界革命”与“小说界革命”，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，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。

侯外庐40年代撰写《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》时，将17世纪的启蒙思想、18世纪的汉学运动以及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作为整体叙述；五六十年代开始酝酿分而治之，80年代因注重“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”，方才明确从百日维新说起的论述策略<sup>[13]</sup>。侯氏的思路颇有代表性：80年代中期以后，晚清社会及学界生气淋漓的新气象，日渐吸引研究者的目光，即便不喜欢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化”这样的大题目，也都倾向于将康、梁、章、严、罗、王等从清学中分割出来。

不管是章太炎、梁启超，还是罗振玉、王国维，都喜欢谈论清学，尤其推崇清初大儒的忧世与乾嘉学术的精微。对于清

学的叙述成为时尚,并非意味着复古,反而可能是意识到变革的历史契机。假如将蔡元培、钱玄同、胡适、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学人对待清学的态度考虑在内,此一走向更能得到清晰的呈现。从宗旨、问题到方法,中国现代学术都将面目一新。之所以谈论清儒家法,很大程度是为了在继承中超越、在回顾中走出。即便主张保皇的前清遗老(如沈曾植、罗振玉等),学术上也都颇具创新意识,绝非一句“清学的殿军”所能简单描述。晚清以降,不管是否曾经踏出国门,传统的变异与西学的冲击,均有目共睹。面对此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学界虽有“激进”与“保守”之分,但上下求索、为中国社会及学术闯出一条新路的心态,却是大同小异。

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,这点比较容易被接受。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,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“共谋”,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。如此假设,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,这里先概述一二,具体的讨论请参见书中各章。

有幸“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诸论”的史家陈寅恪,对其时治经颇尚公羊春秋、治史喜谈西北史地的风气有深切的体会,强调其影响超越专门学问,而及于整个社会思潮:

后来今文公羊之学,递演为改制疑古,流风所被,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,浪漫之文学,殊有联系。<sup>[14]</sup>

相信“学为政本”或主张学术能转移风气的老辈学者,多能领会此中难以实证的奥妙。比如,钱基博曾提及王闿运“喜为异说而不让,敢为高论而不顾”的说经,一转手而为廖平、康有

为，再转手而为吴虞之“决弃一切”——后者已入“重新审查一切价值”的五四时代；钱穆则由晚清学风之“非怪诞，即狂放”，未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“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”，论证何以辛亥革命后几十年，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走上正轨<sup>[15]</sup>。或由经学转为文学，或从学风延及政治，二钱的论述，均不为现代学科设置所限。

“五四”一代学人，似乎更愿意在具体学问的承传上，讨论其与先贤的联系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《导言》部分，胡适高度评价章太炎用全副精力“发明诸子学”且能“融会贯通”，并称“《原名》、《明见》、《齐物论释》三篇，更为空前的著作”。顾颉刚 1926 年为《古史辨》第一册撰写长篇自序，突出康有为、章太炎的影响；晚年所作《我是怎样编写〈古史辨〉的？》，则强调“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”。类似的论述，如鲁迅怀念章太炎、郑振铎追忆梁启超以及钱玄同谈论康、梁、章、严、蔡、王等十二子的“国故研究之新运动”<sup>[16]</sup>，均能显示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勾连。

后世史家论及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历史联系，多兼及学业与精神。如余英时称“不但五四运动打破旧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，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、章诸人发展出来的”，以及王泛森讨论章太炎对于钱玄同、吴虞、鲁迅、胡适、傅斯年、顾颉刚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影响，均着眼于精神的承传<sup>[17]</sup>；而恰好又是余、王师徒，格外关注胡适、顾颉刚对于史学革命的贡献<sup>[18]</sup>。

不过，倘若由此得出结论，晚清、五四可以合二为一，则又非立说者的本意。周予同在高度评价康、章贡献的同时，不忘强调“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”，理

由是，胡适“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，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，来涂饰它”，更能代表新范式的确立<sup>[19]</sup>。此说是否过誉姑且不论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：胡适那一代学者，确实不为传统经学的家法与门户所限，对西学的汲取与借鉴，也比上一代人切实且从容。

事实上，五四那代学者，对上一代人的研究思路与具体结论，都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。就以常被论者提及的顾颉刚对康、章学说的借鉴而言，“顾氏对他们的学说都只取一部份，舍一部份，对康有为，舍的是尊孔的精神，取的是疑伪言论，对章太炎，取的是反孔精神，舍的是章氏对古文经的信仰”<sup>[20]</sup>。而顾氏之所以有此胆识、有此创获，与清末今、古文经学激烈冲突，“各各尽力揭破对方的弱点，使得观战的人消解了信从宗派的迷梦”有关；更离不开曾出入今古两家的钱玄同之指引以及胡适对“西洋的史学方法”的介绍<sup>[21]</sup>。古史辨运动与晚清经学的联系脉络清晰，常被论者提及；至于哲学、文学的变革以及考古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建设，也都适合于戊戌生根、五四开花的论述思路。

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，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，这种论述策略，除了强调两代人的“共谋”外，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。相对来说，上限好定，下限则见仁见智。在我看来，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，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，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<sup>[22]</sup>。另一方面，随着舆论一律、党化教育的推行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、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，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## 二 “西潮”、“古学”与“新知”

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、颠覆儒学中心、标举启蒙主义、提倡科学方法、学术分途发展、中西融会贯通等。构成如此纷纭复杂的图景，既取决于社会思潮的激荡、个人机遇及才情的发挥，也有赖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。三者兼而有之而且谁也逃避不了的严峻课题，则是如何协调“西潮”与“古学”之间的缝隙与张力。

晚清人眼中的“西潮”，一如其关于“古学”的言说一样五花八门。反过来说，每个人心目中的“西潮”，往往与其关于“古学”的定义密不可分。倘就具体学者而言，主张“西学东渐”的，与提倡“旧学新知”的，很可能势同水火；可对于理解历史进程来说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相对来说，“西学东渐”来头更大，也更引人注目，即便心有疑虑者，也不便公开反对。尤其是从甲午惨败的反省，到五四运动的崛起，中国西化步伐之疾速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在时贤眼中，“西学”就是“新知”，中国变革的动力及希望，即在于传播并借鉴“西学”。起而抵御西化狂潮的，有极端保守派，但也有自认深知西学利弊，且对中国文化传统持有信心的，比如《国粹学报》诸君。

《国粹学报》第七期上有一宏文，再三论证“国粹也者，助欧化而愈彰，非敌欧化以自防，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”<sup>[23]</sup>。如此曲为辩解，就因为其时的新学之士，已将“欧化”等同于“新知”。但实际上，《国粹学报》“痛吾国之不国，痛吾

学之不学”的创刊宗旨，直接针对的，正是此“醉心欧化”的狂潮<sup>[24]</sup>。不妨以主办人黄节、邓实的两篇文章为例。前者称：“不自主其国，而奴隶于人之国，谓之国奴；不自主其学，而奴隶于人之学，谓之学奴”；后者则希望借表彰周秦诸子，“扬祖国之耿光”，进而实现“亚洲古学复兴”<sup>[25]</sup>。依此思路，比起推动“西潮”来，复兴“古学”更能获得“新知”。这自然只是一家之言，可聚集在其旗帜下的，除了邓、黄，还有章太炎、刘师培等一大批重要学者，实在不可等闲视之。

虽然也有“本报于泰西学术，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，皆从阐发”的表态，《国粹学报》依然“以发明国学、保存国粹为宗旨”<sup>[26]</sup>。甲午战败后，时人普遍“观欧风而心醉，以儒冠为可溺”，提倡西学者理直气壮，反而是邓实等人的“摭怀旧之蓄念，发潜德之幽光”<sup>[27]</sup>，显得有点不合时宜。可是，从晚清的《国粹学报》，到二三十年代的《学衡》、《制言》，再到90年代悄然升温的“国学热”，20世纪的中国，并非“西学东渐”一枝独秀。

1923年1月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创办《国学季刊》，提出“整理国故”的三大策略：“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”、“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”、“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理解”<sup>[28]</sup>。这篇由胡适起草的“宣言”，强调“国故”与“国粹”的区别，除了“扩充国学的领域”，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意识。“输入学理”与“整理国故”并重，这本是“新思潮”的重要特征<sup>[29]</sup>；可落实到具体语境，则往往各执一词，互相攻讦。不少新文化人出于对“复古派”的高度警惕，很难认同“整理国故”思潮。像陈独秀那样破口大骂的固然不多，但忧心忡忡者不少<sup>[30]</sup>。实际上，经过五



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人，即便日后从事国学研究，也都很少完全拒斥西学，成为真正的“国粹派”。

同样“整理国故”，《国粹学报》与《国学研究》的论述策略颇有差异。对前人的思想学说，到底是突出批判意识，还是强调“具了解之同情”，取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。作为西化的代表人物，胡适为了缓和同人的不满，强调自己钻进“烂纸堆”，是为了“捉妖”“打鬼”。将“整理国故”的目的简化为“化神奇为臭腐，化玄妙为平常”<sup>[31]</sup>，这与其极力划清界线的“爱国主义史学”，同样属于“主题先行”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正是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尴尬之处：为了与复古派划清界限，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。至于具体论述中，倾向于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，更是很难完全避开的陷阱。即便如此，本世纪的中国学界，仍以“疑古”而不是“信古”为主流<sup>[32]</sup>。

在国学与西学、信古与疑古、抵御西学与批判复古截然对立的论述框架中，很难平心静气地体会对方的合理之处。于是，兼采东学西学、超越非此即彼的言说，成为本世纪中国学者的最大愿望。王国维“学无新旧，无中西，无有用无用”之说<sup>[33]</sup>，虽系至理名言，却有些悬的过高；不若陈寅恪“对于古人之学说，应具了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笔”，以及钱穆“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”的说法<sup>[34]</sup>，有其直接的针对性。撇开本世纪中国学界以反叛传统、表彰异端为主流，便无法理解陈、钱立说时深切的忧患。在社会思潮中，确有盲目复古的“爱国的自大狂”；可在学术界，最大的弊端，还是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。

章太炎《国故论衡》中有一段名言，常被论者所引用：